

唐代县级政务 运行机制研究



A Study of County Administration and
Local Governing Mechanism in Tang China

赵璐璐 著

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丛书

包伟民 / 主编

唐代县级政务

运行机制研究

A Study of County Administration and
Local Governing Mechanism in Tang China

赵璐璐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研究 / 赵璐璐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9

(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201 - 1427 - 1

I. ①唐… II. ①赵… III. ①县 - 地方政府 - 行政管理 - 研究 - 中国 - 唐代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3108 号

· 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丛书 ·
唐代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研究

著 者 / 赵璐璐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李建廷

责任编辑 / 卫 羚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62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427 - 1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唐宋史研究丛书” 总序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唐宋史研究中心计划集编出版“唐宋史研究丛书”，下文谨述其缘起与基本思路。

隶属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唐宋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10年，它是一个汇聚同好而组成的松散学术团体，一个学术交流平台，旨在推动关于中国唐宋历史研究领域的发展。除了不定期地举办学术讲座、召开学术会议外，中心主要的事务是从2015年起编辑出版年刊《唐宋历史评论》。现今在此年刊基础之上，同仁们经过集议，认为有必要集编出版一套专门以唐宋史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丛书。

一方面，至少在形式上，这套丛书可以将中心成员学术著作汇集起来，以显示“学术团队”的总体力量。目前中心主要由本学院以及本校国学院从事唐宋史研究的教师组成，并聘有校外兼职研究员，经常参加中心学术活动的有20余人，还有已经毕业或在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数十人。中心成员的学术兴趣涉及唐宋史众多领域，大致有政务文书与政治体制、社会经济、城市、财政、律令制度、宗教与民间信仰、历史文献、历史地理、医疾、民族关系、敦煌吐鲁番文献，以及辽金政治、地理、史学等多个议题。今后随着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推进，我们的研究力量与研究议题必然会不断扩充与拓展，用一套学术丛书来集中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构建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学术团队的合适途径。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套丛书的集编出版，反映了我们关于如何深化唐宋史研究的一些学术思考。《唐宋历史评论》“发刊词”曾指出：

唐宋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周秦之变以后再次经历重大社会与

文化变迁的时期，魏晋以来相承之旧局面，赵宋以降兴起之新文化都在此时期发生转变与定型。唐朝以其富强，振作八代之衰，宋代以其文明，道济天下之溺；唐宋并称，既有时间上的相继，又有文化上的相异。唐、宋的时代特色及其历史定位，要求唐宋历史的研究突破原先单一的唐史研究、宋史研究画地为牢，囿于一代的旧局面，构建“唐宋史观”的新思路，树立“唐宋史研究”的新框架，在更为宏观的历史视野中观察、理解中古史上的唐宋之变。

所谓“构建‘唐宋史观’的新思路，树立‘唐宋史研究’的新框架”，当然不仅仅是将习称之“唐宋变革”或“唐宋转折”的两端扯到一起，让两个断代史领域叠加起来而已，而是希望推进研究范式的某种转变，是如何从长时段“会通”地来观察历史的问题。

不同历史解释体系对于唐宋间存在着一个历史转折似无异议。从明人陈邦瞻（1557~1628）所论“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①，到20世纪初由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1866~1934）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提出的“宋代近世说”，认为唐宋之间存在一个历史的“变革”^②，及至现今仍流行于欧美学界的“唐宋转折”论，细节上虽多有差别，主旨却基本相同。

即便按照传统的、将整个中国帝制时期都划入“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法，由于这个“封建社会”过于冗长，学者们也都试图将其再细分为不同的时段，以便于深入讨论。他们有将其分为前、后两期的，也有分为前、中、后三期的。但不管哪种分法，唐宋之际都是一个分界点。^③

从内藤氏以来，学者们对这个转折的具体内容做过许多侧重面略有差

①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附录一《宋史纪事本末叙》第四册，中华书局，1977，第1191~1192页。

② 论文原载〔日〕《历史与地理》第九卷第五号（1910年），黄约瑟中译本，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第10~18页。关于由内藤此文影响下形成的“唐宋变革”论，可参见邱添生《论唐宋变革期的历史意义——以政治、社会、经济之演变为中心》，《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七期，1979年5月。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③ 参见白钢《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异的描述。陈寅恪（1890～1969）先生以“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①一语来概括唐代前期历史，最为精到。此外也有一些学界前贤，发表过一些相当有启发性的意见，向我们展示了这种长时段、全方位观察视野的犀利目光。

但是，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前贤的这些论断的影响，似乎更多地只体现在引导学者们去关注唐宋之间历史的变异与断裂，不管是称之为“变革”还是“转折”，都是如此。近数十年来我国史学的发展现状是，虽然关于应该摆脱断代史框架的束缚，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着眼，以“会通”的视野，来观察中国历史的沿革与变化的立场，差不多已经成了学界常识，但将这种常识落实到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去，则还处在言易行难的初步阶段。具体就宋代历史研究领域而言，集中表现在制度史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应该从晚唐五代去追溯宋代制度的渊源，但真正“会通”的成果尚不多见。总体看来，唐与宋各自分为两个“断代”局面未见有大的改观，中间那道隔离墙并不易被拆除。

唐宋两朝研究各自囿于断代史畛域的主要原因，并非仅仅出于历史文献过于庞驳、史事制度过于复杂，以致多数学者以一人之心力，难以兼顾，而在于观察的视野与分析的理路，常常局限于一朝一代，未能拓展开去。我们强调应该跳出断代史的框架，摆脱一时一地的局限，以会通的眼光来观察历史，也绝非以为凡叙述某一史事，都必须从唐到宋，甚至更长时段地，跨朝越代，从头说到底。实际上，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绝大多数专题，都不得不具体落实到某一个“断代”的某些侧面，跨朝越代式的史事叙述，对于不少学者来说，无论在精力上还是智力上，都是不太容易应对的挑战。因此，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要以一种会通的立场、眼光与方法去分析处理断代史的问题。

所谓“转折”，指从一种形态转向另一种形态。但是，假定了“转折”的存在，绝非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将其两端相互割裂开来。毋宁说，基于对“转折”的认识，更要求研究者持有一种长时段、全方位的观察眼光，从历史前后期本来存在的有机联系入手，来讨论造成“转折”的种种因素，分析“转折”的前因后果。

① 陈寅恪：《论韩愈》，原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后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96页。

如果未能明了赵宋以降文化史与思想史的基本走向，就不太可能真正理解韩昌黎（公元768~824）“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历史地位。同样的，未能充分掌握中原地区古代服饰演变的全局，认清秦汉而下直至明清，含蓄收敛服饰风尚实为常态，倒是“非华风”的盛唐风范实属例外，仅以唐宋间的简单对比，来划出“开放”与“保守”的文化分野，就未免流于世俗的片面之论了。笔者近年讨论宋代城市史，跳出传统的唐宋间产生所谓“城市革命”，亦即主要从历史的断裂层来作分析的思路，改为更多地观察唐宋间城市历史的延续性，小有收获，也可为一例。

所以说，如果能站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前后转折的高度，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来做观察，关于“唐宋转折”的假设不仅不会使我们将唐宋间历史机械地割裂开来，反而会更推动我们去探索它们相互间的有机联系，深化对它们的认识。这大概就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可能带给研究者的丰厚回馈。

相对而言，如何通过观察历史后续的发展，也就是元明清各代的历史，再反过来验证自己对唐宋时期历史的分析，或者在对历史后续发展的观察之中，来就前期彰显未明的史事的走向，获得一些启发，关注者看来更少一些。同样的，据我们对元明清史研究领域的粗浅观察，论者能跨越断代，将对史事的梳理上溯至唐宋者，似亦有限。因此，对于许多制度的沿革，史事的源起，常常只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

前贤的许多论述，例如前引陈邦瞻之语，接下去又说：“今国家之制，民国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还有近人严复（1853~1921）之所论，“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成，什八九可断言也”^①。或者如王国维（1877~1927）所说“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②。这些议论虽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也多见引于学者的论著之中，但它们之所指出的历史现象，真正被学者纳入自己的观察范围，予以深入讨论的，则不多见。

易言之，鉴于学术史的现状，立足于唐宋的观察视角的学术意义，还在于可能推进对经由唐宋转折定型的中国帝制后期历史的贯通性研究。这

① 严复：《严幾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第39通信札，见《学衡》第13期，1923年1月，第12页。

② 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宋代金石家》，见《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

样的贯通性研究，无论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唐宋，还是元明清，或者今天的中国，都是极为必要的。

所以，立足于“唐宋”的观察方法，不仅要求我们拓宽视野，将7~13世纪整个民族的历史活动纳入分析讨论的范围，更需要我们将观察的眼光从一代一朝、一时一地，拓展到民族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同时，它也必将会对我们的学术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归纳而言，我们这套丛书以“唐宋史”为题，收录论著的具体议题自然不出唐宋两代的史事，而且多数仍不免分别讨论唐代或者宋代，但观察的视野与分析的理路，则希望不仅要会通唐宋两代，关心的时段也比唐宋历史时期还要广泛一些。更重要的是，与其说这样的专题选择是出于一种学术领域的划分，不如说是基于一种自以为更合适的学术方法与学术眼光的思考。我们希望以这种更具有透视力的学术眼光来自励，并希望以此为深化对民族历史的理解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具体就丛书的集编组织而言，我们希望能够遵循学术研究的自然规律，不分批分辑，杜绝批量生产，同仁的论著成熟一本推出一本，积以岁月，观以长效。同时，也欢迎学界同好加入我们的研究团队。

谨此说明。

包伟民

2016年3月30日

序 一

中国古代国家管理制度非常发达。西方有学者认为，秦汉帝国就具有“现代国家”（Modern State）特征。商鞅变法以来的中央集权体制，其在地方上的管理核心是郡县制，而郡县制的核心，则是县级管理体制。赵璐璐博士的这本书就是研究唐代县级管理体制的专著。

研究县级管理体制的重要性，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央集权体制最终能够正常运转，依赖于县级政府的执行力。只有在县级政府落实了，中央的意志才能得到实现。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观察，一是观察地方对于中央政策的执行力度；二是观察中央政府的变化，如何影响到县级政务运行方式。本书的二、三、四章，之所以按照唐前期、唐代中后期、唐宋之际的时段来划分章目，就是因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及中央管理地方模式的转变，会极大地影响县级政务运行体制。

其次，古人把县官称为“父母官”，因为他们是直接接触老百姓的。县级以下就是胥吏，唐朝人所谓杂任、杂职，就在相当程度上指这些人。这就使得县级政务运作很难像上一层级的政府那样，通过文书传达来实施，而必须是践履型的，必须有一道执行力的传送带，这就为县级政务运作带来许多鲜活的内容。本书在第一章第二节，对杂任、杂职等内容深入讨论，其用意即在于此。

最后，中央的指令往往是理想形态，县域政务运作会展现出实践形态。理想丰满，现实骨感。中央政令是怎么样在生活中“打折”的，这种“折扣”如何由于实际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构成了历史的丰富多彩。唐宋之际，军镇对于县级行政的干预之兴废，就属于此种情况。历史研究只有深入这个“折扣”层面，才能触摸到生活的温度。

过去的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从正史《百官志》或者《职官志》的资料出发，偏重于机构设置、职官执掌的考察。但是，传统律令格式的资料，

则会对机构之间的文书传递及其体现出来的政务运行程序有更多的揭示。过去在这方面最贵重的史料是《唐六典》和《唐律疏议》的相关部分，近些年《天圣令》被发掘出来，包含了政务运行机制更丰富的内涵。即使其中许多政令早就存在于《通典》之类的传统史籍中，也因此而更加得到重视和发掘。赵璐璐这部书对《天圣令》的史料给了足够的重视，值得赞赏。

如前所述，毕竟县域政务不是完全靠律令文书展开的，于是，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一些残存文书就成了基层生活的“卷宗”，它反映的才是县域及其下属组织的实态政务运作。我们发现，一些关键问题，赵璐璐都是通过这些资料揭示清楚的。

隋唐时代的国家治理体制，相比于秦汉，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魏晋南北朝制度发展的逻辑结果，也是中央集权体制下，国家治理机制不断探索的结果。在中央，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度，就是汉武帝以来内朝班子与外朝班子的综合性改革的成果。在地方，州郡这一级是去掉各种地方辟署的官员，这不仅是加强中央集权，也是一种务实，裴寂年十四补州郡主簿，你就知道这些职官尸位素餐，多么荒唐；在县级，则是放弃完全按照中央机构设置的六司佐史分工模式，强化县级长官的责任，更是一种务实的改革。

中国的县级行政，十分悠久，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制度之一，也是具有现代生命力的制度之一。它也具有国际性，比如日本的县制就是中国制度的移植。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行政制度中，“县”改“市”，如火如荼，像北京这种地方，已经没有了“县”，而我们的“市”“区”的行政机构，恰恰是近代从日本学来的。这是国际化吗？还是近代以来学习东洋的惯性行为？令人唏嘘！唐朝人务实，县级模仿中央的六司设置后来进行了省并重组，可是我们今日各县的“局”级机构完全对接中央部委，造成人浮于事，冗官冗费。令人感叹！我希望，璐璐博士的这本著作，不仅对于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是一种推进，而且能引发主管部门的深思，对中国县域行政体制机制的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张国刚

2017年10月6日 北京清华园

序 二

本书以作为国家政务运行基层组织的县司为研究对象，从人员构成与属性、职能范围与政务内容、机构地位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梳理唐代不同时期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的变化，其落脚点或关注面是唐宋间国家治理体制和国家形态的转变。

随着制度史研究的不断积累，近年来“国家”议题重新受到重视，带出了对中国古代传统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构建途径和基本特质的探究。其中，唐型国家与宋型国家存在着哪些实质性的差别，宋代国家的构建路径及唐和五代十国背景和缘起，这样两个基本面向上的诸多问题受到了集中的关注。国家形态意义上的唐型国家和宋型国家之分，并不意味着唐朝与宋朝的国家体制和政务运行机制完全断裂而无连贯性，也不意味着唐朝的结束和宋朝的建立就标志着两种类型国家的终结和确立，实质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君主（及制度化皇权）在国家政务裁决体系中位置的前移及其带来的君相关系的变化，使职差遣作为一种机制得以自上而下贯彻，商品经济发展和土地买卖限制的取消带来乡村基层组织形态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通过基层行政机构对乡村进行户口、赋役和司法控制的强化，等等。这是一个需要进行多方位研究并加以新的综合的重大论域，确切的概念界定还有待具体研究的积累和理论构建的完善。

在朝廷和中枢机构的层面，本人曾经从公文形态与政务运行的角度粗略揭示出使职行政体制和“中书门下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趋势。这个假设性很强的论说，引起了关注唐宋之际制度转型问题学者的讨论和批评。唐史学界的批评和补充，主要在于一些对具体史料的理解以及某一种政务文

书的行用范围和裁决程序等方面。^① 最重要的补充性讨论还是宋史学界直接或间接提出的,体现在关注晚唐五代十国时期藩镇体制对北宋国家形态基本特质的影响,包括枢密院与三司作为相对独立的两个成系统的政务体系及相关政务运行机制的形成,以及其与中书门下宰相机构之间关系的厘定。^② 在藩镇的层面,80年前于鹤年提出的“藩镇时代”^③ 概念重新受到重视,对藩镇外部问题中的朝廷与藩镇关系,以及藩镇内部的权力构建与政治运作,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④ 尤其是关于藩镇的州郡化与州郡权力结构及其政务运行机制的藩镇化,藩镇使府幕职官的“州县官化”与宋代幕职州县官体系之形成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了很大推进。^⑤ 这些都有助于加深对唐宋间国家形态演变历史进程的认识。

在行政基层和乡里层面,学界在借鉴日本和欧美学术界关于中国区域社会和宋元明转型研究的基础上,亦积累了相当的成果。尤其是关于地方官府政务运行机制的特征、以赋役征派和司法控制为核心的基层政务具体内容的变化以及基层组织由乡里制向乡村组织的变化等方面,学界陆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和历史线索。这是近年来“政务运行”概念引入唐宋地方行政制度史研究以后出现的新进展。本书是这方面综合研究的一个积极尝试,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考路向。例如,隋唐之际县司的机构和人员设置从附属于府州、对应尚书六部的调整发展,到唐宋之际则转而呈现出新的趋势,即从州县一体走向县政独立,县级政务运行机制更主要服从于不断变化的基层政务。换言之,隋和唐前期县级政务运行机制具有鲜明的设计成分,但在实际行政运行中很快就出现了矛盾。整个唐代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的变化动因,主要就在于突破行政体制因革和设计而带来的与实际政务处理需求不相符的掣肘,寻找到真正适合基层政务管理需要的运行机制,把地方和基层政务有效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地方行政各层级由于管理

① 参见刘后滨《文书、信息与权力：唐代中枢政务运行机制研究反思》，载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② 参见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张亦冰《北宋三司财政行政体制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③ 于鹤年：《唐五代藩镇解说》，《大公报·史地周刊》1936年3月8日。

④ 参见张天虹《唐代藩镇研究模式的总结和再思考——以河朔藩镇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⑤ 参见郑庆寰《体制内外：宋代幕职官形成述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闫建飞《唐末五代宋初北方藩镇州郡化研究（874~997）》，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任务和目标不同，具有各自的中心政务。各层级中心政务的分化和确立，随之出现的中心政务之外的某些行政权力的下移，是地方行政体制变化的一条重要线索。如何在国家治理体制与机制转型的视野下梳理唐宋间基层政务运行机制的变化轨迹和历史进程，将是唐宋史研究中一个值得从多角度探讨的重要议题。宋型国家与唐型国家比较，可以看出地方官府政务范围及其职权行使方式、政务管理机制的变化，以及中央管理地方模式的变化，进而导致地方官系统中亲民官与厘务官的分离，州府属官中巡检官与监当官的增设，以及地方政务系统的分化等现象。这样的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制度史（官制史、法制史、兵制史、礼制史、财政史等）、经济史和社会史，需要有更新的研究视角和更全面的知识整合。本书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可以预期的是，随着有关唐宋时期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社会治理能力、身份管理体系以及统治精英阶层生成和再生机制等相关研究的深化，传统国家形态中的唐型国家向宋型国家转变的历史脉络将更加立体地被揭示出来。

如何处理中古时期基层行政和国家体制的关系问题，在研究方法上需要进一步探讨。如果从朝廷和中枢层面着眼，顶层的相关制度和律令势必对地方社会或者基层生活发挥塑造作用，这种作用通过由上而下的行政传导和科举制造就的文人官僚而产生。本书关于隋和唐前期的叙述基本按照这个思路展开。如果把基层作为出发点，地方经验或者基层行政机制对国家体制和政务运行机制产生的影响将更受关注。本书关于中晚唐出现的新变化的叙述，则大体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最近十几年来关于地方行政体制和藩镇研究所采取的思路和揭示的问题，也大体如此。但是，国家体制和地方实际的行政运作的相互影响，是否存在先后或者优先性问题？如果转换思路，进行交叉研究，不仅仅关注顶层制度设计或者基层实际运作，而且是寻找合适的案例，探究二者之间的互动和关联，或许是更能切近历史真实的有效办法。晚唐五代时期应是进行这种交叉研究的合适时段，对于赋役征派蠲免、治安管理或者官员选任等某一类事务，朝廷、藩镇和州县在处理时有分工的不同侧重点，也有藩镇、州县和朝廷在政务定性和行政处置权方面的沟通。宋代的国家体制包括中枢体制和地方行政体制的最终定型，大体应是在政务定性、行政权属和职能分工这几个层面上形成了一致性的合力。如此宏观性的贯通考察，是本书目前还没有也无法达到的。但本书力图从地方行政视角将各个层级政务分工和行政环节梳理清楚，一

定意义上也是为这个主题做研究准备。这应该可以视为本书在唐宋间国家体制和国家形态转变问题上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从学术史的发展看,一些核心话题的提出,往往以一些重大理论预设(科学假说)为依托。从中国古代史研究来说,例如中古士族问题、均田制问题、唐宋变革问题、城市革命问题、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都与社会形态理论和历史分期理论密切相关。由于提出者和最初的一批讨论者大都是其时最杰出的学者,在他们学术影响力的辐射下,这些话题提出后,一般都能够以其惯性受到较长时间的关注和追踪,而且话题切分得越来越细致,尽显片面深刻。但是,随着大的理论环境的转移,这些受惯性作用而产生的深刻研究,也出现与其所出自学术命题当初被提出时的理论关怀相脱离而流于个案化、具体化的趋向,导致研究碎片化且缺乏方向性,大量的研究因此陷入同质性的重复。最近几年走向学术前台的中青年学者中间,已经有一些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要回到核心议题提出时的理论语境,吸取大量个案研究中的有效积累,对接20世纪上半叶具有理论关怀的学术高原,实现又一轮的知识整合和议题更新。从作为本书基础的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和写作开始,作者就有意识地在克服一段时间以来理论被惰性地浮泛化和议题被深入地碎片化的研究取向,力图提出一些具有涵盖性的判断和概念,建立起具有一定宏观关怀的叙述逻辑。这样的努力无疑值得鼓励。

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隋唐史研究所依靠的史料具有鲜明的特点,不仅不能如明清史那样依靠详备的史料来叙述一些历史进程的完整环节和各个侧面,也无法与印刷术发展起来之后的两宋时代史料相比。但是,隋唐时期的史料留存量和留存形式颇具独特性。第一方面是官修史书至唐朝而体制大备,除了对前朝史的修撰之外,在制礼作乐和强调因革损益的背景下,唐人对于本朝史事及典章制度不间断地加以概括和总结,《大唐六典》《大唐开元礼》《通典》等典制文献及基于国史修成的《旧唐书》,都是以往朝代从未有过的史料留存和编撰。第二方面是中国传统史学及历史编撰学至宋朝而高度发达,宋人对于作为前朝史的隋唐历史有着大量多角度的资料汇编和历史撰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大型类书、《唐大诏令集》《唐会要》等史料汇编性政书以及《资治通鉴》等通史性著述,其重心都在隋唐五代史。这使得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经历过加工汇编而显得相对完备。第三方面是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和应用时间的差

距,使得中国古代的官私文书和著述在魏晋隋唐时期经历了一个纸质写本的时代,纸质写本文书留存下来的机会甚少,端赖于唐朝统治区域达于西域,敦煌、吐鲁番(包括新疆其他地区)等干旱地区保存下了数量不菲的文献,尤其重要的是一批不同时期的具有档案性质的公私文书。这是其他任何时段的历史研究中无可比拟的独特资料。资料留存数量和留存形式的以上特殊性,使得隋唐史研究历来重视史料的全面发掘和深度解读,重视将经过编纂和加工的史料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语境,重视具有一定宏观高度的理论解说与建构。基于这样的史料特点,唐宋之间具有相互支持的意义。由于唐宋制度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所具有的高度关联性,寡少简略但被整理得极富条理的唐代史料有助于我们从繁冗杂乱的宋代史料中找到主线和内在逻辑关系,而相对繁富详尽的宋代史料所揭示的制度分化之后的某些细节和流程,可以帮助我们找出许多唐代的问题,激活和加深对唐代制度的理解,拓展唐代制度研究的问题空间。理解唐代制度绕不过宋人,要厘清宋代的制度,从宋人如何总结和建构唐代制度入手,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本书在史料的运用方面,也体现出这样一种自觉,在《唐六典》《通典》等典制文献、敦煌吐鲁番文书、出土墓志以及《天圣令》等文献资料的综合运用和贯通理解方面,都有良好表现。例如书中关于“杂任”概念及其在地方官府人员构成地位和作用的讨论,就是借助《天圣令》并结合传世文献推进已有研究的成功之例。由于史料的局限,唐史研究中基层制度与基层社会的研究还难以严格划分出因地区差别而形成的类型。作为西北边陲政务文书档案遗存的敦煌吐鲁番文书,是否能够反映唐帝国的整体特征,依然存在一些理解上的分歧。本书是将其作为反映唐帝国整体制度的政务文书来运用的。在唐前期律令制的时代,如此运用史料应该是合乎情理的。本人曾经撰文指出,《天圣令》残卷的发现和整理刊布,对于唐代政务运行机制的研究来说,在传世的编撰史料和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档案文献之间,架起了会通相关史料的津梁。在《天圣令》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于一些以往较少关注或泛泛而论的问题,探讨的深度和细节性将有很大的改观。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诚如高明士、黄正建等指出的那样,《天圣令》作为一部以唐令为母本的宋令,对于研究唐宋国家治理机制的变化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本书的研究初步呈现出了这样的研究价值。

本书的成绩和问题自当有读者去评论。我借着赵璐璐在博士学位论

文基础上整理出来的专著出版之机，将近来有关唐宋国家形态转变具体路径和复杂面向相关问题的思考做一简要梳理，权以为序。并请读者批评指正。

刘后滨

2017年10月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地方与中央政务对接：隋和唐前期的县级机构	20
第一节 隋代地方行政体制的改革及其对应尚书六部的发展趋势	20
第二节 唐代前期地方行政体制及州县官府的人员构成	30
本章小结	58
第二章 体制划一与机制差异：唐前期县级政务运行机制	60
第一节 唐代前期县司的固定性政务	60
第二节 县司处理公文书的程式与地方政务的长官负责制	78
第三节 从赋税征收程序看县级政务的特点	93
第四节 里正与唐代前期基层政务的管理	106
第五节 州县一体化格局中的县级政务及其运行机制的特点	114
本章小结	122